

主 编：王 焯  
副主编：李 菁 夏光武

# 海洋文明



# 汉语文学书写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海洋文明



# 汉语文学书写

主 编：王 焯  
副主编：李 菁 夏光武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洋文明与汉语文学书写/王焯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15-4859-2

I. ①海… II. ①王… III. ①文学创作-写作学-研究 IV. ①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124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mailto:xmup@xmupress.com)

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970 1/16 印张:18 插页:2

字数:305 千字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营销中心调换

## 目 录

- 海洋文化精神与闽南文学的创作意识…………… 朱水涌 唐 琰(1)
- 从“乡土”到“海洋”
- 台湾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郑国庆(11)
- 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中的女性色彩…………… 胡 旭(19)
- 海的显意与隐喻:换个角度论冰心…………… 苏 琼(29)
- 郭沫若海洋体验与《女神》中“海的精神”…………… 彭冠龙 王 烨(38)
- 中国古代文人的海洋情怀
- 历代“海赋”初探…………… 俞琼颖 王 玫(49)
- 从黄鹤龄《不暇懒斋诗钞》看道咸年间台湾社会之状况…………… 刘荣平(67)
- “诗界革命”与近代诗中的海外世界…………… 张 治(82)
- 赋归与重生
- 郑愁予二元归一的海洋书写…………… 徐伟志 史 言(102)
- 论吴钟善的旅台诗歌…………… 江 卉(115)
- “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和政经文化复合视野下的海洋书写
- 吴明益《复眼人》对海洋环境危机及其根源的
- 文学思考…………… 刘建华 朱双一(131)
- 《白鲸》的生态意识…………… 阿思汗(148)
- 海洋精神视角下对《迷人的海》的重读…………… 卢婉静(163)
- 窃渺神奇事,岂必尽虚玄
- 试论“二拍”中的海洋叙事及文学指向…………… 彭婷婷(171)
- “烟涛微茫信难求”
- 《聊斋志异》的海洋想象…………… 房珊珊(181)

- 海洋形象的戏剧展示:解读《沧海争流》…………… 李嘉琪(189)
- 论郑怀兴《新亭泪》的江海意象…………… 宋蔓蔓(199)
- 尤金·奥尼尔: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海洋情结…………… 林 燕(208)
- “蓝色”视野中的易卜生剧作研究…………… 喻 路(226)
- 从对抗到回归
- 从《千与千寻》“回归”原型看人与海洋关系的变化…………… 李婷文(235)
- 从惊奇之心开始
- 雷切尔·卡森的海洋生态创作探析…………… 夏光武(247)
- 周国平《南极无新闻》中的海洋意识…………… 宋欣然 王 烨(257)
- 思乡症与怀古癖
- 晚清海外行记的两个侧面…………… 张 治(263)

# 海洋文化精神与闽南文学的创作意识

◎厦门大学中文系 朱水涌 唐 琰

任何一个区域文学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一片文化的沃土,这片文化沃土的底蕴既是文化血缘的延绵传承的累积,又离不开这片土地特有的自然人文环境。从公元4世纪初的永嘉之乱开始,至12世纪宋室南迁的800年间,闽南大地接受了数次中原大规模的移民高潮。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如年轮一般地沉积下来,累积成为闽南文化的主体。因而,就文化血缘上看,闽南文化脱胎于中原文化。但“闽天不长闽海长”。福建是海洋大省,闽南地区更是直接面对海洋,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蕴含着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闽南的文化精神中无疑融汇着海洋文化精髓。作为闽南精神有机构成的海洋文化,必然会在闽南文学中形象地表现出来,这不仅直观地体现为作品中有着较多的涉海内容,而且表现在闽南作家较为自由的个性、开放的心态和敢于冒险进取的创作风格上,他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冲突中,展开的是渗透着海洋文化精神的艺术创新追求。

## 一、闽南海洋文化的形成

所谓海洋文化,是指涉海人群在从事涉海性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闽南地处东南沿海之滨,面对台湾,扼东北亚与东南亚航运的要冲,与亚太地区的海上联系十分便捷。其海岸线绵延数百公里,湾中有湾,港中套港,沿海港海湾众多,并具有不冻不淤、风平浪静、深水岸线长、通海航道优良等特点,港口资源得天独厚。此外,闽南沿海岛屿众多,较大的就有金门岛、厦门岛、东山岛等,辽阔的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物产,享有宝贵的渔业资源优势。正是这独特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海洋活动条件和优厚的海洋自然资源,使海洋自古以来就成为闽南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闽南民众“以海

为田”、“赁海为市”的生存方式,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创造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海洋文化,形成一种浓郁的海洋文化氛围。

闽南古文化萌芽初期,即与海洋文化相伴而行。迄今为止,考古发掘的闽南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都出现于沿海地区,这些遗址又被称为贝冢遗址,由人类食用海洋贝壳类生物的弃物堆积而成,这说明闽南最初的人类是以贝壳为主要食物的。很多遗址中还发现了数量不少的鱼类骨头,其中有些属于远海鱼类,这就进一步表明,新石器时代的闽南古人类已经向蔚蓝的大海进军,这足以让人想象起闽南先民与浩瀚大海搏斗的勇气和技巧。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在南方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其分支的闽越人以“习于用船,便于水斗”而闻名,他们活跃于福建、浙江、广东的海岸线,创造了长途远航的奇迹。闽越国灭亡之后,原为闽越人一支的疍家人继续漂泊于福建沿海各地,他们最早被称为“游艇子”,后改称“白水郎”或“泉郎”,其典型特征就是以小船为家,坚持海上生涯。要知道,台湾海峡风暴盛行,浊浪滔天,古代疍家人却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出没自如,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们高超的航海术和造船术。据史料记载,两汉三国期间,台湾海峡的交通已是十分频繁,还曾有数次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这都与疍家人这个世界历史上少见的海洋族群有着直接联系,他们不断融入闽南人中,滋养了闽南人的海洋文化强势。总之,闽南濒海先民从“兴渔盐之利”的近海渔猎,到“行舟楫之便”的渡海远征,典型地体现了早期海洋文明的特征,为闽南后来拓展海洋事业奠定了基础。

六朝时期,中原南来的汉族移民大量迁入闽南沿海,汉人精致的工艺技巧和本土居民的海洋实践日益融合,逐渐形成了精于造船和擅长航海的闽南海洋文化传统。自唐宋以来,福建成为全国造船业的中心,闽南则一直是福建造船业的中心,其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提升,海外贸易有了重大突破。到了唐代中期,泉州已是外商进贡中国的主要口岸之一。宋元之际,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到福建境内,泉州港一跃成为中国对外最大的贸易港口,进入鼎盛时期,同东亚、南亚、西亚、东非共计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关系。由于海外巨商不断前来,泉州渐有许多番商定居,泉州港不仅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而且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活跃的“光明之城”。此外,悠久的航海历史使闽南产生了许多海洋神灵,到了南宋,妈祖崇拜风行于闽南民间,元初朝廷加封湄洲神女妈祖“护国明应天妃”尊号,终使妈祖超越众神,成为海洋的最高保护神。此后,妈祖信仰随闽南人的足迹传播海内外,至今已是的国际性的华人信仰,妈祖文化也成为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象征。

明清时期,朝廷几度厉行海禁,但闽南地瘠民稠,生存空间狭迫,向海发展

是势所必然,于是民间出海走私贸易在官方禁令的夹缝中悄然兴起,发展到后来影响到朝廷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明代隆庆元年,漳州月港成为当时中国沿海唯一一个被允许进行出海贸易的市镇,到了明万历年间,每年进出月港的大商船,多达 200 余艘,月港与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群岛各国,以及朝鲜、琉球、日本等 47 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贸易往来,并且以吕宋为中转站,与欧美各国进行间接贸易。依托着这一背景,闽南海商集团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商界一支重要的力量。明末清初,郑成功父子经营台湾,对外贸易逐渐向海上的岛屿转移。自此一直到清代中叶,厦门港的海外贸易在国内都居领先地位,中国各口岸的海商集团,也大都是闽南海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仅控制着中国的海上贸易,而且控制着南洋各国间的贸易,于逐波争利中将闽南人的海洋精神发扬光大。

当近代中国沿海各地的海外贸易重新繁盛的时候,对外贸易重心转移,闽南的外贸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然而闽南与海外的联系则进一步向人的交往和文化的交往两个层次延伸,由此迈上了文化交流的新台阶。一方面,闽南人以更大的规模向海外诸国移民,有相当多的闽南人直接依靠侨汇生活,这种国内少有的现象成为闽南海洋文化高度发展的又一标志;另一方面,闽南长期以来是中国与海外世界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鸦片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了有识之士寻求救国图存之路的热情,他们穿越重洋向西方取经。闽南作为近代海上丝绸之路和繁忙商贸的大动脉,得风气之先,成为传播西方先进思想的黄金海道。而东西方文化在闽南这一土地上的激荡,也构成中华文化革新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最终确立了闽南海洋文化的独特地位。

## 二、发现海洋:诗意与写实的交融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的“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提出,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海洋型文化,以商贸为其经济重心,是一种动的文化,具有冒险、扩张、开放、斗争等特点;东方文化所代表的内陆型文化,以农耕为其主要生产方式,具有保守、苟安、封闭、忍耐等特征。虽然这一观点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偏见,带着片面性和内在的悖论,但其在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揭示不同文明的性质上,却自有着合理的内核。中国毕竟是一个以大陆文明为主导的农业国家,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政权结构到思想规范,都建立在农业文明的经济基础之上,“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和



“重农抑商、陆主海从”的观念根深蒂固。农业文明对于海洋文明的涵化,以其不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农业社会结构的基础为限度。因此,海洋文化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与之相对应的是,古代文学创作中很少出现海洋形象,海洋在文学中大多是作为寄托情感想象的喻体,带着与现实描写很不一样的幻想成分。因此,从《山海经》等上古文本和秦皇汉武海上求仙的叙事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绵亘着一个海上神仙想象的抒情和叙事传统<sup>①</sup>,产生了诸如《镜花缘》、《聊斋志异·罗刹海市》等神异作品。

毫无疑问,闽南只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长期纳入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国家之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央对地方的统辖,既是政治的、经济的,又是文化的,因此闽南文化仍然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建构起来的文化。然而闽南的地理环境既远离中原,又恰是我国大陆的濒海部分。如果说地处边陲所赋予的文化上的“远儒性”特征,使闽南较少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教化规范和制约,从而表现出更多的非正统、非规范的文化特征的话,那么在海洋环境中生长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海洋文化,作为一种中华文化大传统下地方文化发展的小传统,已经浸透在闽南民众日常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之中。在闽南,“海洋”有如农耕者的“田亩”一般,是人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而由此产生的闽南海域风情也别有韵味。这一切,深刻影响了闽南籍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与封建统治者对波涛汹涌海洋的陌生、恐惧、禁海的心态不同,他们往往能够跳出以陆地农耕为中心的认知框架,融入与海洋有关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这些深受儒家经典文化熏陶的传统文人,一旦有了与海洋多加接触的机会,眼界和心胸都大为开阔,这也就带来了闽南传统文学的海洋性特征。

首先是闽南古代文学中新鲜的海的意象与形象。海洋世界给予闽南文人墨客的震撼,激起他们的创作冲动,从而将海的种种新奇景象形诸笔墨,抒写一种极为开阔的情怀。如元末龙溪诗人林弼在《呈克明县尉》一诗中咏道:“长帆破浪出南溟,天际成山一发青。上国重来观壮丽,东州近喜洗膻腥。儒冠未际风云会,神剑长冲牛斗星。尊酒宜春楼上月,也胜细雨夜然灯。”<sup>②</sup>作者描写在大海风涛中乘风破浪的情景,表达的正是一种由目光拘囿走向眼界宽广的欣喜,其报国襟怀和大海的壮阔与苍茫交集为一,诗的形象与多数报国情怀之作有别。明代漳州才子郑怀魁盛赞月港:“富商巨贾,捐亿万,驾滕艚,植参天

<sup>①</sup> 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题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sup>②</sup> 林弼:《林登州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页。

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约千寻之修缆……”<sup>①</sup>遣词造句极尽铺陈之能事，抒情中描绘了当时大多数人依然极其陌生的海港情景。闽南文人对于海洋的关注、考察、感受和描绘，因与自己切身体验的密切关系，而与内陆文人幻想的海上仙境有很大的不同，往往融入写实性的因素。例如北宋蔡襄作《宿海边寺》诗，就写出了以打鱼为生的渔家人的生活情景：“潮头欲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怪得寺南多语笑，渔船争送早鱼回。”<sup>②</sup>该诗描写的是渔户满载而归后的交货场景，诗人却能在喧闹的日常情景中体味到一种简单生活的快乐与满足，由此心情舒畅，困意顿消。这种诗意与写实性的交融抒写，即使在描绘海洋神仙的作品中，也是区别于内陆诗人的一个标志。从元代起，闽南海神妈祖的崇拜风盛，天妃宫庙的相继兴建，成为闽南区域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不少文人咏之叹之。时人洪希文的《续轩渠集》中就有一首《题圣墩妃宫湄洲屿》的长诗，是现存较早的天妃宫诗，描绘详瞻细致，作者不仅详细描写了妃宫周围的环境、妃宫的建筑、天妃的形象，而且以想象夸张之笔，描画天妃出入波浪、不畏艰险护佑过往船只的情景，抒写民众对天妃妈祖的爱戴敬重之情，诗虽颇具浪漫色彩，却又富有写实的海与宫庙的勾画，比起内陆文学写海时的想象，有着更具体更现实的成分。

海洋文化的要点，一是在生产经营方式上，虽没有放弃农耕，却更倚重于商贸；二是在民性特征上，相对于“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内陆百姓而言，海洋环境中的人不再本分守成，而是勇于冒险拼搏，信守“爱拼才会赢”的准则。闽南文人丰富的涉海生活阅历，使他们敏锐地看出向海洋发展对于沿海民众的重要性，从而在诗文中增强了对海洋的认同。五代时期莆田人黄滔的《贾客》诗云：“大舶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鲸鲵凿上路，何如少经过。”<sup>③</sup>在这首诗中，海洋不止是诗人表达想象欲望的诗意所在，它还成为了现实挑战的地理存在——大海仍然是浩瀚无边的，但它的波涛起伏中蕴藏着无限机遇和丰富宝藏；人在大海面前依然是渺小的，但只要敢冒险、勇于探索，未尝不会获得巨大的回报。北宋时福建惠安进士谢履所作《泉南歌》曰：“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sup>④</sup>此诗表明了一种向海洋要生存的新意识，道出闽南人放弃单靠耕种的生活方

① 郑怀魁：《海赋》，载《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② 蔡襄：《蔡襄全集》卷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③ 《全五代诗》卷八十四，第2页。

④ 王象之：《舆地纪胜·福建路》，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53页。

式,将眼光投向浩瀚无穷的大海、造舟通异域的社会现实。元代泉州开元寺僧人释大圭诗赠商人曹吉:“君今浮舶去,因识远游心。衣食天涯得,艰难客里禁。春帆连海市,暮鼓起相邻。一笑归来好,高高寿百金。”<sup>①</sup>十分准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海商的观念和对理想的追求,同样显现了诗人视野的开阔和海洋文化意识的增长。至于海洋型经济带给闽南社会的种种变化,也被闽南文人尽收眼底,成为他们描写的重点。泉州在唐朝已是“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重要贸易港口,到了宋代,海外贸易的厚利使传统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诗人刘克庄的《泉州南郭吟》咏道:“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唯有桐城南廊外,朝为原宪暮陶朱。海贾归来富不贫,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sup>②</sup>诗歌对民众重商趋利意识与铤而走险精神的把握,可说颇得海洋文化之精髓。商业繁荣还引来了大量外籍海商,元末明初僧人宗泐《清源洞图为洁上人作》诗云:“缠头赤脚半番商,大舶高樯多海宝。”<sup>③</sup>典型地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同时也凸显了海洋文化的开放性特征。而在长期以海为田、贩海兴利的实践中,闽南地区逐渐形成了“海中以富为贵”的社会风气。明代曾任漳州府通判的王炜在其《清漳十咏》中写道:“奢竞乃民俗,纤华亦土工,丕盘箫鼓,灯火绮罗中。茉莉头围白,槟榔口抹红,良宵上元节,纨扇已摇风。”<sup>④</sup>详尽描绘了漳州府城及漳州地方崇尚奢侈、俗好浮丽的情况。同安名士池显方(天启四年举人)所撰《大同赋》曰:“又有嘉禾,弥迤鹭门……旁达西洋,商舶四穷。冬发鹳首,夏返梓枏。朱提成岳,珍巧如嵩。醞醖如淮,肴品若徙。俳优传奇,青楼侑觞。……”<sup>⑤</sup>以典雅的韵文,勾画出一幅贩洋贸易所带来的辐辏奢靡的港市生活图景。观念和世风的转变,标志着一种文化特质的真正形成,而闽南文人对这一过程的吟咏,也代表了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一道鲜明的分野。

除了在诗文中“发现海洋”,闽南文人还应用其他文体表达自己的海洋见识和观点。清康熙二十二年夏,郑成功政权败亡,江山归于一统。20多年后,福建同安人江日升完成了一部记录明末清初郑氏史事的长篇小说《台湾外记》。作者既能就近采撷大量确凿史实,灌注一种闽南人对闽南人特有的感情

① 释大圭:《曹吉》,载《梦观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页。

②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

③ 宗泐:《全室外集》卷四,《四库明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光绪)《漳州府志》卷卅八,“风俗”。

⑤ (民国)《同安县志》卷二十五,“艺文”。

和评价,又对地方文化特色特别是海洋文化特色有着很好的把握。例如小说写到郑成功秉持强烈的海洋意识,发挥其家族性的经商特长,走上“通洋裕国”的道路,还翔实记录了一些沿海官员对于清廷禁海迁界政策的非议和抵制,这些都和当朝者“农桑为本”的立国思想大异其趣。此外,与一般的地理著作和传统的文人游记不同,元代久居泉州的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漳州著名学者张燮的《东西洋考》、清康熙年间同安人陈伦炯的《海国见闻录》、清乾隆年间漳州落第举子王大海的《海岛逸志》,以及近代厦门人林鍼的《西海纪游草》都放眼于海外,或是基于闽南人海洋经验的积累,或是根据作者亲自游历的见闻,不仅备述各地航海路线、风土人情、贸易货物等,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借异质文化对大陆封闭心态进行反省,阐明自己的海洋观,可谓海风熏染下闽南文学的一类特殊产品。

如果说历史上的闽南文人出于经世致用思想,更多偏重于揭示海洋的社会属性,那么进入现代以后,闽南作家在西方文化思潮的东渐大潮中,通过对海洋自然天性的发掘,既拓展了海洋的文化意蕴,又融入了新时代精神和创作主体的人格情趣。以许地山为例,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海世间》、《海角底孤星》,还是散文《海》,都有着大海那如梦如幻的影子。在科学知识甚少的古人眼里,海洋因其博大和深邃显得神秘莫测,从而被想象成孕育着超人类生存的空间,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就存在着把海复杂化、人间化、神秘化的倾向。许地山笔下的海意象则有明显的现代性和私人性。他的小说《海世间》中的“海”是海底生命的根源:“我们没有什么神,只有这蔚蓝的盐水是我们底生命底根源。可是我们生命所从出底水,于你们反有害处。”它像生命一样神秘、美丽,又是几近透明的简单,“海底美丽就是这么简单——冷而咸”。许地山还原了海的自然面貌,拂去了古人加在海上的神秘面纱,同时他又以海为载体,宣扬他对生命、对美的理解:“什么叫人造世间,什么叫自然世间?只有你心里妄生差别便了。我们只有海世间和陆世间底分别”,“凡美丽的事物,都是这么简单的,你要求它多么繁复、热烈,那就不对了”。然而海作为意象,不可能是原来的事物本身,必定要掺入作者的主观意识,许地山在这里通过对海的“简单”本质的凸显,试图唤醒人们不要沉迷于自己心造的海的图景之中,表现出自己不同于古人的审美意识和生命哲学。大海有时也成为许地山表达佛教哲理的审美触媒,散文《海》写到大船在海难中沉毁后,“我”和朋友于风狂浪骇的海面上,坐在一只不如意的救生船里,随着波浪颠来颠去,朋友说:“划桨么?这是容易的事,但要划到哪里去呢?”“我”说:“在一切的海里,遇着这样的光景,谁也没有带着主意下来,谁也脱不了在上面泛来泛去,我们尽管划吧。”以大海作为自己

宗教人生观的隐喻和象征,而这种隐喻包含着现实人生态度,其中略带有宗教悲观色彩。

### 三、自由·包容·创新

海洋文化是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正如黑格尔就海洋带给人们的独特观念和心里所做的精辟论述:“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有限的圈子……”<sup>①</sup>海洋自然天性浩瀚壮观,变化多端,自由豪放,奥妙无穷,蕴藏着巨大能量,人类在与海洋的互动中所创造的海洋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品格。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个性创造,它追求独创,从这个角度看,勇于进取、善于变通、敢于超越的海洋文化精神就与艺术创造精神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海洋文化也必然会对作家的创作意识产生深层的影响。<sup>②</sup>就闽南文学而言,“海洋”在其中长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历代闽南作家大致都在闽南海洋文化精神的文化氛围熏陶中成长,养成了较为自由的个性、开放的心态和敢于冒险进取的精神,这促使他们不断萌发较强的艺术创新的愿望和动力。

首先,海洋的不羁天性造就了海洋文化自由开放的特征,使人们在与大海的亲密接触中接受了自由个性心理的熏陶,自然地敞开心怀,朝向大洋的辽阔海上航行,与面对土地的朝夕刻苦经营,无疑有着很不同的思维和视野。因此,面对浩瀚大海的闽南作家往往能够以真挚的情怀去拥抱生活,在创作中留下自由心灵的印记。明代晋江人王慎中就不断探讨古文的得失,率先提出了师法唐宋的观点。当时古文走上了复古的道路,但明代前期古文复古以秦汉散文为标准,由于过于泥古,在模仿古人的过程中便失去了自己的个性。王慎中就此弊端倡导唐宋古文精神,他本人对宋代的曾巩最感兴趣。虽然“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成就远远比不上韩愈、苏氏兄弟等人,但王慎中则能从曾巩的

<sup>①</sup>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34页。

<sup>②</sup> 柳和勇:《试论海洋文化对浙江现代作家创新追求的深层影响》,载《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散文中看到独特的价值,认为唐宋八大家中韩文虽好,却因过度泥古而艰深晦涩难懂。而宋人的散文平易流畅,强调心灵的自然流露。王慎中虽倡导学习唐宋古文,却不盲目崇拜八大家,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在继承唐宋文的“文道合一”、“法度自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为其言”,反对机械模仿,主张作文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语言,比同时代的林鸿等“闽中十才子”的泥古,更体现出一种海洋的气息。王慎中的文学主张和对唐宋古文的提倡,对明清之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次,海洋连接着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人类异质文化产生交流、联动的最重要途径。流动沟通的海洋赋予海洋文化多元包容性,使人们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敢于在比较中继承文化传统,也敢于突破传统,面向未来。生活成长于大海边的闽南作家,往往就先天性地具有宽阔的文化视野和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能够很快地接收来自异域的最新事物和最新信息,善于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取长补短,自觉吸取外域艺术的精华,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自近代以来,闽南文人在沟通东西方世界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精通六国语言的辜鸿铭,曾在欧洲游学多年,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将中国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译成英文,又用英文写了《春秋大义》、《尊王篇》等,以莎士比亚式的典范英文向西方展示中国的古代经典与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另一位风格独特的文化学者林语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他既向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又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的活动,无论是对西方人还是对中国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充分体现了闽南作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品性。

再次,生命本源性的海洋,容易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思考。海洋文化往往积淀着有关个体生命、个人价值的深层哲理蕴含。人的精神本质在与大海搏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呈现,汹涌的大海,既让人感到自己的渺小,生命的脆弱,但也培育着人对生命的尊重,看到人的力量、人的伟大。文学是人学,从艺术创造与人的本质力量有密切联系的角度看,海洋文化无疑蕴含着较强的表现人的本质的审美创造因素,这促使闽南作家对艺术表现人的本原精神展开思考和探索。明代晋江人李贽,祖先曾以航海经商为业。作为明代文化界最不安定分子,他涉足许多领域,不论在哪个领域,他都要向权威挑战,冲击禁锢人们思想的“围墙”,疑他人之所不敢疑,道他人之所不敢道。李贽文学理论的核心是主情性,其《焚书·读律肤说》云“发于情性,由乎自然”,而为了强调情性之真的重要,他进一步提出了“童心说”,直指所谓儒家经典、圣贤之书对个性的束缚乃至对人性的扼杀,已包含了关注个体生命、重视个人价值的因素。这样

一位历史上第一个对封建统治思想提出全面批判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出现在闽南地区,显然与闽南的海洋精神有着紧密的关系。

最后,奥秘变化的海洋容易培育人类开拓的意愿和创新的意识。大海的深不可测、变化无常、亘古常新,不断激励着人类去认识它、利用它。因此,人类创造海洋文化的历程,实际是一个逐渐深入认识和探索创新的过程。海洋的变幻与人类的执着追求,熔铸成海洋文化的开拓创新特性,充分体现了人类的创新追求。创新是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艺术审美创造的重要美学内涵,海洋文化的开拓属性就此蕴含着艺术创新精神,它让人们在真切感受海洋文化独特魅力的同时,养成追求创新的思维趋向,也成就了闽南作家在文学史上创造了不少开风气之先的实绩。纵观闽南文学的发展,有不少艺术创新表现。李贽是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文化开拓创新者,他不仅在文学理论上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而且开了明清评点小说的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评点长篇小说的评论家,他还第一次将小说、戏剧这两种民间流传的艺术形式与传统的经典文学相提并论,推崇个性化的人物塑造方式,提出“化工”的艺术境界,强调人与自然化为一体,奇天地造化之功,为中国的文学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除李贽之外,闽南文学的开拓创新实绩不胜枚举,从明代俞大猷开始的一批闽南军旅诗人,以豪迈的气概、坦荡的胸怀开创了“海战诗”的新类型;现代诗人杨骚早在1921年于日本求学时就开始新诗的创作尝试,他在1924年创作的《心曲》是新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诗剧之一,他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发起人之一,和同仁一道推动新诗现实主义创作,其代表作长篇叙事诗《乡曲》无论在新诗题材上,还是在农民英雄形象的塑造上,都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当代作为新时期“朦胧诗”的主将之一,舒婷的诗多以第一人称写成,信念、理想、正义与良知,都通过“我”这一抒情形象表现出来,诗行中充满了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在抒情中大胆融入了现代主义的技巧,其也成为一代诗风的代表人物。

尽管闽南文学的种种艺术创新追求不尽然由海洋文化的直接影响所致,但海洋文化内涵的多元包容性和创新拓展特性,必然有益于闽南作家养成宽阔的艺术视野,进行大胆的艺术创新实践。大海,无疑赋予闽南作家艺术创新的灵感和精神。

# 从“乡土”到“海洋”

——台湾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厦门大学中文系 郑国庆

21世纪以降，“海洋文学”成为台湾文学场域中一个新进场的美学位置，参与着台湾文学场域象征与物质资本、资源流动的竞逐。这一美学位置的出现，无可讳言地与本土化运动后台湾“海洋国家”、“海洋文化”的提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将在后面更为具体地分析这一位置崛起的动因，但同时希望能够拉长轴线，在一个更宽广的文学史脉络中来探讨台湾文学有关“海洋”书写（包括，但不限于目前所定义的狭义的“海洋文学”）的意义，观察“海洋文学”对于此前台湾文学史海洋书写的拓展、深化或窄化。

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运动”，改变了台湾文坛的风貌，对战后台湾文学/文化的发展可谓影响深远。这一运动对于日后台湾文学/文化发展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台湾意识”的开启。乡土文学透过将题材定位为台湾本土现实，使得此前空洞的反共怀乡文学与偏向精英主义的现代主义都不太注意的台湾庶民生活渐渐浮上台面。台湾的地理风土、民俗民情于焉呈现出具体的图景与生动的形貌。

乡土中的“土地”与“人民”是乡土文学书写的重心。黄春明的宜兰、王禛和的花莲都是日后评论家津津乐道的代表性的乡土书写。对于台湾这个海岛而言，海洋显然是广义乡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趣的是，乡土文学的乡土想象多半偏于土地与农人，对海洋与渔民则着墨不多。

有关海洋、渔村与渔民生态，在王拓的一些小说中有较多的呈现。现已成为乡土文学名篇的《金水婶》写的是小渔村里走街串巷卖杂货的台湾底层妇



女,与海洋关系不大。另有一篇不甚著名的《炸》<sup>①</sup>则涉及了20世纪70年代台湾渔村的贫穷问题。渔民水盛因交不起孩子的学费,铤而走险去炸鱼,结果不仅没炸到鱼,自己反而被炸断手臂、炸伤肚子。整篇小说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冬季的大海湿冷潮腥,偏远的小渔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大海对于水盛们来说,“是一个充满奇诡的丰富的生命,像个仁慈而严厉的母亲”。在她心平气和的时候,她允许“在她广宽无垠的丰满的胸脯上吸收营养生命的乳汁”;当风暴发作时,大海又是“神秘、可怖”的,散发出“不可抗拒的威严”。大海吞没了水盛的父亲,也曾经弄残了同村的阿贵、承业、乌义,现在轮到了水盛。“炸鱼”这种违反冬季休渔规则的行为,终遭到大自然毫不留情的反噬。在这里,贫穷与生态的冲突远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降台湾“自然书写”对于工业化、城市化环境污染的保育反思,而是为求温饱的贫穷与大自然惨烈的抗争。

王拓出狱后所出版的长篇《牛肚港的故事》<sup>②</sup>更进一步地铺开了海边渔村的纵深。小说以一桩渔村命案起首,以警察对案件的调查展开叙事。小说的主人公赵孝义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所激发的“回归现实世代”<sup>③</sup>,到牛肚港从事乡村教育。故事主要围绕着国民党威权体制对赵孝义这位理想主义青年的监控、侦讯、迫害的过程展开,间杂对渔村风俗民情的描写。这部长篇曾经被龙应台评价为“一部‘失败’的政治小说”<sup>④</sup>,在艺术技巧上有很多缺失。但是它的乡土素描部分,龙应台则肯定“相当传真动人”<sup>⑤</sup>。

以“庶民文化”的角度重读这部小说,其间最意味的部分毋宁是知识分子面对在地庶民知识的反应。村里妈祖庙是村人生活信仰的中心。庙祝陈进财因亲生儿子意外身亡,从而对恭信敬奉的妈祖产生怨憎,变成一位不信神的人。一方面作为一名“进步知识分子”,赵孝义视乡人的“迷信”为愚昧,因此颇为欣赏陈进财对妈祖的訾议;另一方面,陈进财对于道德、生命所抱持的虚无主义态度,既暗合赵孝义内心深处不时涌出的知识分子的虚无感,又让赵孝义感到恐惧,“那双深深凹陷的眼睛所流露的病态的狂热、不安和混乱,使他感到巨大的恐怖”。事实上,小说到最后揭示出陈进财正是害死女儿的真凶,暗示

① 王拓:《炸》,载《台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王拓:《牛肚港的故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

③ 参见萧阿勤:《回归现实——台湾1970年代的战后世代与文化政治变迁》第二章:《七零年代回归现实世代的浮现与形成》,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版。

④ 龙应台:《政治小说?唉!》,载《龙应台评小说》,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

⑤ 龙应台:《政治小说?唉!》,载《龙应台评小说》,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